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渊源、传统与发展创新”

——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会议综述

王格非 张 肃*

2020 年 9 月 19 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共同举办了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既是对老一辈政治学者治学精神的学习和继承，也是对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能力的重新审视，在总结前辈学者学术成果、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扎实的成果。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形成的共识有四个方面。

一、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的钱端升

钱端升先生是中国现代政治学重要奠基人、著名政治学家和法学家。1900 年出生于上海，17 岁考入清华学校，19 岁被选送美国留学。1924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在清华大学任教，1927 年和 1930—1933 年间曾在北京大学兼任任教，1937 年正式入职北京大学，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政治学系系主任、教授。1952 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先生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生培养、课题研究、机构创办和知识普及

* 王格非，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张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等方面为北京大学和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北京大学俞可平在题为《既要讲政治，也要讲科学》的开幕演讲中，肯定了钱端升先生在引进和创立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体系过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钱端升先生将政治与政治学区分开来，很清楚地认识到传统中国重视政治，但却缺乏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的弱点，因此对于引进政治科学的责任意识很强，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知识性贡献，也推动着中国政治学在学术交流中走向世界。俞可平指出，从钱端升先生的政治学文集《政治的学问》中可以看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文化知识的普及、民主制度的推行和行政效率的提高，是钱端升先生提出的政治现代化的四个基本要素。在今天，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推进政治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钱端升先生那一代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使命。

钱端升先生的家属代表钱仲兴先生在发言中概括了自己对于父亲的三点认识。其一，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所谓“爱国”体现在钱端升先生始终希望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能摆脱受人欺凌的屈辱状态，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其二，他是一个高产的政治学学者。钱端升先生除了与人合作翻译了大批政治学外文著作外，在《清华周刊》《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以及他自己主办的《今日评论》上面也发表过诸多文章，这些文章都紧密地结合了中国实际与世界形势。其三，他是一个热心的教育家。他一生几乎没有脱离教育岗位，在海内外培养了诸多优秀学生，师生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保持了良好的师生情谊。

北京大学王浦劬按照发端、发展、更新与再建四个阶段对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发展进行了回顾。政治学是北京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历经120多年的发展，在北大一代代政治学人之间不断传承。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跨越三个世纪，在改革、革命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学术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同行，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行，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同行。以学术研究探索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道路，一代代学者把自己的人生、事业和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紧密

联系在一起，毅然肩负起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使得政治学学科发展获得持续恒久的强大动力，政治学学术发展不断前进。钱端升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王浦劬指出，在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学习前辈学者的精神，继续推进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会议的意义所在。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钱端升

纵观钱端升先生的一生，他既是一位潜心于学术研究、具有学人本色的政治学者，又是一位积极评论政治、具有家国情怀的爱国知识分子。与会学者围绕着钱端升先生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二者兼顾的这一突出特点，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重点讨论了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钱端升先生，认为钱端升先生有着非常大的胸怀和抱负，希望在保持自由身份的同时，通过舆论参与和影响政治。而他参与的方式是在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上发表政论。从政治立场上来看，钱端升先生是一个“蝙蝠型”的自由知识分子，既坚持作为一个学者的信念伦理，又坚持作为一个政论家的责任伦理；既坚持自由民主的思想观念，又主张有理想、有能力的独裁，是比较现实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全面抗战时期，这种现实主义表现在钱端升先生曾寄望于国民党作为中心势力建设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全面抗战，但国民党的腐败和抗日无能激起了他对旧秩序的失望和对新秩序的期盼。如何在民主和秩序之间保持平衡也成了钱端升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关心的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的钱端升先生浓缩地体现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情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的复杂和困境。

北京大学欧阳哲生则从钱端升与胡适两位知识分子的交往谈起，认为二人私交甚笃又政见不同。钱端升与胡适在求学与任教、报刊社评、私人书信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往来，在国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对外的对日政策问题上展开过多次讨论。胡适不相信所谓新式专制，在《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章中，胡适认为当今中国无法实行专制，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

园政治，而专制政治是最难的；钱端升则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表示反对，认为中国需要极权国家的力量来进行沿海各省的工业化，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必须依赖一种开明的、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胡适主张有条件地对日妥协，以争取为准备抗战所必要的国力；而钱端升则表达了自己不妥协地坚决抗日的立场。总的来看，钱端升先生的思想倾向于爱国主义和进步主义，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一生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爱国、进步的一个缩影。

北京大学钱元强认为钱端升先生兼具“学人”与“士人”的特点，既保持了“学人”的本色，又具有“士人”的情怀。钱端升先生立志为学，21岁时就立下了“学者，吾唯一之希望也”的志向。在政治学研究中，钱端升先生在西洋史、各国政治制度、行政制度、宪法史、比较宪法以及国际关系诸方面均有所长，著作颇丰。钱端升先生先后完成了《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及英文版《中国政府与政治》五部比较政府的专著；翻译《英国史》，把握国际政治；重振“员吏制度”研究，开创中国现代行政学研究；撰写《战后世界之改造》，主张和平外交政策；修订《比较宪法》，致力于中国政治和法治的发展。钱端升先生终其一生践行了“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的学人本职，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框架构建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钱端升先生主张“士人教育”，“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作为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钱端升先生的家国情怀促使其投身于民国时期的政治实践，比如追随蔡元培先生任职国民政府大学院、参与国民参政会等，以寻求中国国家秩序和强力政府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先生一方面参与成立“外交学会”，拓展了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另一方面积极投身政法建设，为法制中国的实现和中国“新政治学”的发展而不懈努力。钱端升先生所主张的建立起一个强力政府的设想在新中国实现了，所期盼的建立起一个独立、统一和强盛之国家的愿望也在新中国实现了。而钱端升先生希望中国政治体制逐渐走向“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最终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理想，也在推进中。

这次研讨会将对钱端升先生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对钱端升先生可能产生影

响的老师、同学、弟子的研究。清华大学谈火生介绍了钱端升先生的老师——美国哈佛大学的何尔康（Arthur Norman Holcombe）教授并探讨了何尔康对于钱端升学术研究的影响。何尔康曾任哈佛大学政府系系主任以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培养出了一批如约翰·肯尼迪、基辛格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等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何尔康对于钱端升学术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研究主题和治学风格三方面。在方法论上，师生二人均重视历史的作用，强调历史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1919—1924年钱端升先生赴美留学期间，适逢美国政治学转型，强化量化研究，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方法。但何尔康认为政治学是艺术而非科学，运用科学的方法非常困难。受其影响，钱端升先生也秉持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将其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但同时也对政治学能否成为科学持开放态度。在研究主题上，师生二人高度重合。何尔康和钱端升都是从制度的角度切入展开研究，主要的著述也都集中在比较政治、本国政治以及政治理论等领域。而且二人都非常关注本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努力推动本国政治学学科的建设。在治学风格上，师生二人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他们的生平经历来看，二人都先是进入大学任教，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随后由于战争的爆发，二人都进入政府担任顾问，为国家服务。师生二人都横跨政学两界，融学者和士人身份为一体。总的来说，何尔康教授对于钱端升先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北京大学金安平着重介绍了钱端升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梳理了钱端升先生在北大兼任、专任教授期间在时间、空间上可能的同事们，并探讨了同事间交流对钱端升先生可能造成的学术影响。自1927年1月起，钱端升先生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法律系兼任教授，讲授宪法等课程，先后与黄右昌、李锐、张慰慈、燕树棠、陶孟和、徐宝璜、路毓祉、周览、王世杰、陈翰笙等学者共同在北大任教。但由于当时教授的流动性较大，许多学者与钱端升先生共事的时间较为短暂，彼此进行学术交流、产生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较小。相对来说，钱端升先生与同事之间比较稳定的交集是与当时北大政治学系系主任的联系。钱端升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间，政治学系的三位系主任分别是邱昌渭、张忠绂和陶希圣。邱昌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31—1932年担任系主任。与钱端升先生不同，邱昌

渭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更强调地方的作用，在统一和自治中强调地方自治。而张忠绂与钱端升是清华同学、北大同事以及南京政治学会的同仁，1933—1936年担任系主任。张忠绂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外交领域，曾与钱端升一起出国从事国民外交工作。陶希圣在1931—1932年曾经与钱端升共事过，1936—1937年代理和担任了系主任。陶希圣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制度史与社会史，并且是食货学派的创始人。为了北大政治学系的制度史研究以及行政教研室的建设，陶希圣推辞了蒋介石希望他去中央大学的邀请，但最终陶希圣还是走上与钱端升先生完全不同的道路。由于政治学的专业特殊性，学术和政治的交织使得后来的学者难以区分当时政治学人的学术研究、议政及从政等活动的目的是专业追求还是政治行为。钱端升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发出了基于学术和科学立场上的声音，也有政治上的选择。他们的学术风格和发展道路不尽相同，各具特色。学术共同体对钱端升先生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清华大学张小劲从教学生涯、学生群体和入室弟子三个角度介绍了钱端升先生与他的学生的关系。钱端升先生的教学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没有完成的四个阶段：清华时期，刚开始教授世界史、欧美政治史，政治学系成立后讲授比较政治学、各国政府和比较宪法；北大时期，更加关注政治制度以及具体制度设置；西南联大时期，由于经济困难，行政学研究所的建设受到极大限制；政法学院时期，设想建设一个培养国家最高级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未能实现。在这几段教学生涯之中，钱端升先生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学生，如赵宝煦、康敏心（史筠）、王赣愚、陈之迈、王铁崖、楼邦彦、郑秀、陈体强、邹谠等等，推动了政治学乃至中国国家建设的发展。其中楼邦彦和陈体强作为钱端升先生的入室弟子，后来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在行政法和国际法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总的来讲，钱端升先生治学领一代风气之先，开辟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传统；教书育一代英才，指导的学生有许多成为政治学的大家；办学图一代强国之路，从历史到比较政治制度，再到更具体的国家、法政、宪法制度，钱端升先生致力于这些学科的学科建设，希望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此开出一条强国之路。

三、与钱端升的“对话”：中国政治学从传统到现代

钱端升先生 1919 年从清华赴美留学后，先后在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接受了政治学学科的专业训练，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议会委员会：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主的比较政府研究》(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American Congress,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German Reichstag)。显然，钱端升先生首先是一名政治学家。从钱端升先生的学术著作与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现代政治学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及学术议题的设置和变迁。

北京林业大学刘猛由从教经历、著述出版情况、钱端升人物研究、研究的主要特征四个方面对有关钱端升先生的学术文献史进行了梳理。钱端升先生以学术为业，著作高产。他曾经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清华周刊》、《政治学报》、《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期刊上发表了诸多论文，在《今日评论》《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报刊撰写过大量评论，以专著、合著或主编的形式出版过《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等著作，翻译过屈勒味林(G. M. Trevelyan)的《英国史》。刘猛认为钱端升先生的著述有两点特征：其一是受美国政治学转型的影响，从政治制度研究逐渐转向行政学的研究；其二是学术著作出版较为完善，但手稿、日记、档案等还有待整理。对钱端升的人物研究主要包括钱端升先生的自述和回忆文章、年谱与传记、学术研究文章以及硕博论文，但缺乏一部详尽的钱端升传记，期待本次会议能进一步推进对钱端升的人物研究。

复旦大学包刚升就“落后国家如何迈向现代政治”的问题与钱端升先生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了对话。钱端升先生在《现代化》一文中从哲理、政治、经济三个维度对现代化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其中政治现代化意味着自由平等加民主制度。他在关注现代国家的基本权力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同时，又关注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尽管内心倾向于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但具体落实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钱端升先生依然认为“有理想的独裁”优于民主。立足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一盘散沙的政治起点，钱端升先生的政治发展理论既存在这种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之间的张力，又使得他希望实现“一党制、强有力的政府、国家应有中心势力”与“有理想的政治、人民保有自由、和平统一论”之间的平衡。此外，钱端升先生很早就关注了近现代中国的早期国家构建、政治效能、后发展国家、精英与政治转型等前瞻性问题。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刻，钱端升先生当年思考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在当下去探讨与反思；他所关注的政治发展目标，有的仍未完成，未来的路依旧很长。

北京大学张长东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探讨了钱端升先生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启示。钱端升先生对正式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包括《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议会委员会》等著作。他处于被后人视为旧制度主义典范的时期，对三权分立理论以及中华民国五权关系的静态研究都做到了几乎极致的地步。相比之下，当下学者对于正式制度的研究有所忽视。此外，钱端升先生在很多学术论文中也涉及对制度的动态历史演变以及理想政治制度的展望，从中可见他兼顾历史的眼光与政论家的洞察力。钱端升先生关于非正式制度的讨论也值得关注。他曾在一篇名为《政治学》的短文中列举了民众心理、统计研究等美国学界的方法，并强调制度运行背后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大众心理等因素，可见在方法论上他已经突破了旧制度主义的视野。钱端升先生曾经总结当时政治学研究的三个不足：其一是方法论愈发繁多；其二是忽视政体研究而重视职务研究，忽视形式研究而重视运用研究；其三是分类繁多，学科发展过度专业化。这些研究不足在当下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依然存在，这启发我们既要重视正式制度的研究，又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既要关注学科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方向的不断发展，又不能舍本逐末，忽视对学科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

北京大学孙明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科角度探讨了钱端升先生的学问格局与治学气象的启发意义。以钱端升先生主持的《民国政制史》为例，他与同事们将政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使得历史学成为行政与政制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和学术表达方式。《民国政制史》的主要风格是叙述与分析相结合，将

政治学理论融入叙述之中，是“论在史中”而非“以论带史”，对后续制度史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典范的效应。这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界及北大政治学系20世纪30年代平和、朴实的学术气象。同一时期由北大政治学系研究室马奉琛先生编纂的《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第一辑，也令人直接感受到前贤们从制度史入手研究行政制度，从资料入手对制度史有全盘掌握、扎实研究的学术抱负。这种学术气象又是开放和会通的。钱穆的旧史学，陶希圣及食货学派的新史学，都在北大安顿下来。在其传承影响下，后世中国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研究规模已蔚为大观。因此，作为政治学后学，我们要继承钱端升先生那一代学者开放包容的格局与气象，打通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构建基于政治、行政与社会的“整体史”意义上的制度史，让新认识在交汇处生长。

清华大学任剑涛认为“对话”的角度是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他对钱端升先生关注于国家日常权力运行与有效性的政治学思路进行了探讨。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钱端升先生的政治学研究集中在行政学、比较政府领域，对民国政府以及当时法德两国执行权的运行机制都进行了系统描述。显然，从宪法下落到执行权，从行政学或执行权视角审视现代国家建构，是钱端升先生对所处时代的现实环境与学科研习氛围的理论响应。通过钱端升先生对各国政府体制的分析，可以看出他高度重视民治政府的基本定位，并将分权制衡机制作为论述的宪法前提。他从行政学入手重点审视执行效率对民治政府的效能，试图呈现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结构机制与运行状态。事实上，钱端升先生关注的是将国家意志的表达与国家意志的执行分割开来之后，专门处理国家意志的执行机制问题。但这既容易混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界限，也容易忽视国家意志的表达体系，让执行权成为一种政治悬空的东西。钱端升先生向往民主政体而肯定独裁政体的矛盾态度，正是他排斥性地重视执行权、从治国效能评价一国政体思路的体现。可以说，钱端升先生是出于现实国家政治出路的功利考虑搁置了对现代政治信念的追求。钱端升先生的比较政府研究，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他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性品格，也在谋求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知识分子中代代相传。

四、回归与超越：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

在 21 世纪，中国人不仅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政治的科学。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长达 120 多年，但讲政治科学的传统依然尚未形成。将钱端升先生的学术成果与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议题设置、研究方法、理论自觉进行比对，可以获取未来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灵感与启示。

北京大学徐湘林基于 20 世纪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国际视野，分析了钱端升先生学术研究的个人风格与主要特色。钱端升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恰逢美国政治学由欧洲研究向美国研究、制度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型过渡，因此借鉴了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本土化倾向和制度主义传统，并在归国后致力于中国国家研究和政府制度研究的发展，为中国政府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钱端升先生在中国政府研究中加入了对过程的分析，研究了旧制度崩溃和新制度建立的过程。此外，他对于中国政府的研究启发着政治学者应该利用现实经验去总结理论，而不是利用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现实。当今中国政治学学者和学生应该继承钱端升先生的家国情怀，克服政治学庸俗化的问题，重新重视对正式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的研究和探讨，关注重大政治问题和国家前景问题，推动中国政府研究乃至政治学的研究不断往前发展。

北京大学马啸以中国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讨论了钱端升先生的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政治研究发展的启发。钱端升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对法、德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比较宪法的研究。同时，钱端升先生是最早将中国纳入比较政府研究范式之下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的文章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政治制度架构。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学研究主要沿袭旧制度主义的学术传统，研究重点是对各国政治制度本身结构特征的描述和比较。这种国别政治体制研究为 50 年代的区域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50 年代以后，受经济学与社会学影响，旧制度主义日渐式微。理性选择、行为主义、现代化理论等诸多理论学说从多方面批评了旧制度主义只关注国家与国家间的明面条文和正式制度，忽视了相同制度的执行与否以及执行程度会随条件的差异有所不同。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中国

政治研究往往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而拉美、非洲以及南亚、东南亚等区域的研究则处于学术生产的中心位置。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域的政权变更频繁，为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研究话题和契机；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现象更容易被纳入政治学的一般性研究框架之下，更容易找到共性。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成功地将中国政治研究带入政治学的主流。一类用一种传统东方主义的想象来研究中国，将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来解释；另一类则认为中国的强国家性、权威与制度有效性使得中国政体同西方发达国家政体的相似性高于同一般发展中国家政体的相似性，将中国政治研究直接与从发达国家研究中获取的理论进行对话。正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在强国家性方面的相似性，我们要既能从美、日的政治研究中获得洞见，也应当重视研究中国正式制度的现实意义。未来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要充分吸取钱端升先生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经验，重新将正式制度纳入研究视野中。

北京大学罗伟楠从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出发，认为钱端升先生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研究基础。这种基础性的贡献就在于他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基本关注重点以及解答这些问题、重点的方法和思路。而这种贡献同时会促使当今政治学学者进一步反思钱端升先生所奠定的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和常识的范畴。学术发展的动力就来自反思和超越这种常识，发现其背后的世界。目前中国政治学依然沿着钱端升先生所奠定的常识在发展，其中一个常识就是对于政治过程中的人的认识。政治过程中的人是基于信仰、利益或是权利的动机在采取策略并行动，去创造或利用制度。政治学的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些动机才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使政治过程以及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进而基于对于人的认识以及研究者自己是什么样角色的认识，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政治知识和制度体系。无论在此之上建立了多么丰富的方法论和中层理论，自从钱端升先生以来这种基层常识的积淀是没有变的。作为研究者，要回到生活意义的本身，关注没有被纳入政治学分析范畴之内的、常识之外的广阔世界，因为它同样影响着中国治理的进程。政治学学者应该借鉴更广阔的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对于常识之外的生活世界展开社会科学分析，并且在分析之后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或进行一个新的设想，回答、超越甚至终结从钱端升时代至今一直延续的基本问题意识和基

本关注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超越常识的反思不是在旧有研究范畴中去重复做内卷化的工作，而是获得了超越钱端升先生那一代学者的工作的可能性，也是对钱端升先生最大的尊重。

北京大学燕继荣将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学者界定为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着重阐述了北大政治学学者的使命。当下的政治学学者需要发扬钱端升先生的学人风范与士人情怀，肩负起政治学学者应该具有的学术研究者和政治评论者的双重社会责任。这是政治学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大学的一个学术功能就是传承思想，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要能够接续上过去的话题与气象。没有大学和政治学学者，文化和思想就无法被接续，进而导致代际缺乏共同的语言。当今中国政治学学者对于 90 年前的甚至 50 年前的政治议题感到陌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学没有承担和完成好传承文化与思想的功能。要传承北大政治学学科的精神，就要理解钱端升先生乃至那一批中国政治学开端人物的思想、初心与使命，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制度效能性等新的重大议题，结合当下面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新的重大问题，为新时段的政治发展提供政治学人的解释。

从纪念中国政治学前辈和讨论中国政治学传统出发，激发出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新议题、新领域，是这次会议的一项成功的尝试。